2110

闵江市市中区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资料室



内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目录

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特辑

促进团结抗日的一曲凯歌……长　城（1）
抗战时期内江文艺活动述略……梅　英（8）
回忆抗战期中“中艺”、“剧专”、“中术”
　三剧团在内江的演出……肖晴天（稚苓）（10）
四十余年忆“兴华……胡大生（露华）遗作（12）
抗战初期内江商界的一个抗日救亡组织
“三·一三”　剧社……丙丁整理（15）
有关“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几个问题的
　考证……内江市市中区档案局（18）
介绍《长江战地通讯专集》……长　城（20）
内江县“抗敌剧团”概况……肖晴天　刘宗承（23）
内江抗日救亡战线上一群小兵……何剑平（25）
记“爆火炮”给内江市场带来的冲击……宋子麟（26）
成都文史资料记内江孩子剧团……（42）

内江风物

杂谈内江梨园旧事……佚　名（28）
内江城市的变化……邹作圣（30）
内江艺坛旧事……梅　英（35）
　“艺事至今关事变”……（35）
　老舍先生在内江演讲：“抗战文艺新动向及其他”……（36）
　记冯玉祥将军在内江……（37）
内江萝布市的形形色色……阴钧陶、白丁整理（38）
封　面　公园一角　　肖景勋　供稿
封　三　抗日时期的范长江、范长江与夫人沈谱
封　底　1937年3月29日毛主席给范长江的信

促进团结抗日的一曲凯歌

——记范长江冲破国民党十年新闻封锁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的发表

长　城

1937年3月29日深夜，毛主席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提笔给27岁的当年《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写了一封信，信中赞扬说：

“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过了，深致谢意！”（毛主席的信见本辑封底）[1]

“你的文章”到底指的是那篇文章？说法不一，许多同志都认为指的是《陕北之行》。其实错了，《陕北之行》写于1937年4月21日，毛主席的信是3月29日，早于《陕北之行》23天，这“你的文章”必然另有所指。

文化大革命中，长江被诬为“反共老手”，惨遭迫害致死。1979年我去北京收集长江资料，在我们的姑父伍心言的孙子伍丕治同志处，发现一份长江亲笔书写封面和签名的大字报底稿，标题为：“关于《反共老手》问题——答若干同志问。”其前言中概述了在全科委系统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他为“三十年代反共老手”之后，不少相识和不相识的同志，经过各种方式要他公开表态，最后他写道：“在目前被管制的情况下，我只好用写这封公开信的方式，说明一些基本事实，供有关同志参考，至于应如何下结论，革命群众可以自己独立思考。我自己深信，党和群众最后一定能作出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2]

公开信记述了1937年2月9日访问延安的情况：“毛主席和我谈了一个通夜，洋谈了中国革命的多方面的问题，特别详谈了当时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我经过毛主席的教导后，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矛盾问题。我当时曾经考虑长期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大量收集材料，准备写几本大书，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事迹，毛主席却指示我，根据当时全国迫切的政治需要，应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他希望我能立即回上海，设法利用大公报当时在舆论上的比较重要的地位，宣传党在当时最重要的政策。”[3]

因此，可以断言，“你的文章”必然是指长江赶回上海的第二天，即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2月15日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

《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是他打破国民党十年新闻封锁爆炸性的第一炮，当时轰动全国，在促成全国一致，团结抗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此文解放后未能再版，当此纪念抗战胜

利四十周年之际，对它作必要的介绍，想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释放返回南京之后，反脸无情，立即扣留了张学良，旋决定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估计到，蒋介石可能利用其所控制的舆论对全国人民进行欺骗宣传，以达到其“根绝赤祸”的罪恶目的。于是，2月10日，在延安发出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通电》，电文中指出：“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均一发之际……深望贵党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4)但是，这样的通电，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不敢向全国公布。后来事实证明，会议期间，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在会上散发了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提案，并要求传达中共给三中全会的通电，蒋介石还佯称不知道。当时全国人民能知道通电中提出的五项国策，提出要“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的人，恐怕是屈指可数的了。

也正是“通电”发出的这一天，长江闪电式地访问了延安，毛主席高瞻远瞩，力主长江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上海，必须赶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前，想尽一切办法，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各界人士作真实的报道，以促成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当时，离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正式召开，只有四天了，延安去上海，千里迢迢，万山阻隔沿途交通壅塞，社会秩序混乱到了极点。即或到了上海，《大公报》能否发表他对中共主张的真实报道，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大公报》是反对“西安事变”的，在西安事变中，总编辑张季鸾还写了一封《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何应钦印了三十万份派飞机去西安上空散发，信中写道：“你们要相信蒋先生才是你们的救星。”“你们赶快去向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6)看！曾被誉为“为民喉舌”的《大公报》，在这关键时刻，其奴才嘴脸暴露得多么彻底！他们完全站在反共反人民一边。

但是，长江已顾不得这些，他必须尽一切努力，首先必须赶回上海，在与毛主席长谈一个通宵之后，“天明了，我回去‘红大’(红军大学)休息一会，即登车南返。”当天，正是旧历除夕，“晚至宜君，被军队驻满，无立足地，乃夜旦开出，欲寻山庄，天大雾，对面不见人，车上玻璃结冰，司机不能辨路，继而地下道路结冰，滑不能行，但车已至半山上，前后皆无法办，司机乃伸首侧窗之外，勉强前进，费数十分钟，不过行一、二里，司机声言不敢再开，乃停于荒山大雾中。幸下车发现山边有窑洞，入内视之有人家。我们遂买些猪肉烧面条，来过这旧历的除夕。”

“夜间大风雪，昨夜如梦境，十一日起身，白雪荡山涧……，到三原无处买饭吃，还是到一家东北退伍军人开的馆子对付几个饺子，继续开西安。”(7)

终于在“十四日午间凌空的一刹那”(8)离开西安，转郑州，飞往上海。

早在1934年8月，国民党就制订了《新闻检查条例》和《检查新闻办法大纲》，内中规定：“新闻原稿必须送检。”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发表的任何文字，都要在刊出以前，送交国民党检查官检查，检查官得任意加以删削和扣留。(9)上海市党部，早就设置了“新闻检查所，”专司其职，对有关共产党的报道，讳莫如深，一律严加封锁。

怎么办？次日，即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此时，总编辑张季鸾已去南京，报社工作由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主持。

长江下了飞机，已是夜晚，他不顾旅途劳顿，急忙去找胡政之说明情况，胡政之听罢，大为惊诧！

三年前，当长江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时，胡政之就十分欣赏长江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他文笔流畅，识野开阔，为了给大公报笼络人才，还专门从天津去北平与长江个别谈话，亲自审查一番。将长江聘为大公报驻北大的通讯员，“条件是不得与其它报纸投稿，每月给固定稿费15元。”〔10〕后来，胡政之还对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杨士卓说过：“此人才华很高，恐将不易掌握。”〔11〕

是的，没想到，曾几何时，长江就给胡政之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难题！要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冒着风险去发表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这实在是太难了！

当年，《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主张抗日而遭暗杀，《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因发表《闲话皇帝》而被判处徒刑，《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因组织救国会而关进苏州监牢里，胡政之不能不考虑到，此文一旦发表，将承担怎样的政治风险。

然而，胡政之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报人。他曾对《文汇报》创始人之一的徐铸成谈过自己得意的经历：“一是他一九一九年赴巴黎采访巴黎和会的消息，他说这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这样重大的国际新闻。二是一九一七年他随段祺瑞参加马厂誓师，最详细地报道了这一新闻，”〔12〕均为报纸争得了极大的荣誉。因而，对长江即将写出的文章，他认准其关系之重大，必然将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起轰动，而《大公报》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必能独占鳌头，他完全掂出了这篇即将出世的文章的份量。长江也看透了胡政之的心思。于是：“我以为时机重要，全力争取《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敢于发表我从延安归来的报导，并且要能顶住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能基本上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出来。胡政之从《大公报》独占特大新闻的生意经出发，经过反复动摇，终于下了决心，要我立即写稿。”〔13〕

长江于15日深夜匆忙写完稿子以后，特别加上了“记者奉社命”的字样。

事实上，这以前，大公报根本不知道长江去过西安，更不知道他去访问了延安。西安事变时，长江还在绥远前方采访，后来傅作仪告诉他：“释放蒋介石是中共的主张。”在有关的资料中，长江曾这样写道：“当时我虽不知道内情，我预感到这是中国政治的大转折点。”〔14〕“中国的政局必有根本性的变化，可能团结抗战有些眉目，否则中共不可能主张释放蒋介石，这是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也当然是中国当时头等大新闻，可能在中共方面已提出完美的主张，我决心立即撞入西安和延安，为全国读者弄清这一头等大事，我估计《大公报》不会同意，因为他的社论公开反对西安事变。”〔15〕“我没有得到《大公报》的同意，就一个人单独行动。”〔16〕“这时，西北对外交通全断，航空、铁路、公路都不通车，局势十分混乱，无路可走。”“各个不同系统的军队，各据一处，互相对峙。”“我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向西安前进。”“路上数次为军队绑架，因为许多人平时看大公报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的(政治)态度，把我释放了。因此，我在1937年2月撞到西安。”〔17〕所谓“记者奉社命，”是“实无其事，”“不是事实，”〔18〕“这是因为我从延安回上海后，他们在多次动摇和修改我的稿件后，终于同意了发表我的稿件，我给他们一点面子。”〔19〕而上海市党部新闻检查所还是不与放行，“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在长江的全力争取下，胡政之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他终于抵抗了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20〕把我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在二月十五日的报上发表了。当时轰动了上海，报纸销路大增。”〔21〕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胡政之未作大的修改和删节，只是要求“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由于“有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关系和大公报老板能够同意发表的限度，因而此文写得曲折些，

如用‘西北最高当局’来代替‘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如用‘东方政治的精华’来貌似恭维蒋介石，而在当时，读者一看就明白的是蒋介石离西安后所说的一套是假的。”〔23〕这是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青读者所难于理解的。如果，连对蒋介石“貌似恭维”的话都没有，除了地下刊物，这篇文章绝对不可能在蒋介石所控制的报纸上公开发表，全国人民也无从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最重要的政策。

现将其重要章节，摘录于后：

“去年双十二事变，不特震动全国，亦且使世界惊奇，国人对此事之观察，大体多偏于感情的、对人的方面，而对此事件演变之经过及其目前的实况，似乎不无相当隔膜。”〔24〕

“双十二以来所演成的政治形势，其内容关系于我国家民族前途甚为重大，但此种政治趋势，尚在未定期中，将来为祸为福，要视中央当局及全国人士对此事了解之正确与否，与乎处置之方法，是否妥善为断。尤以在此三中全会期间，对此事之前途有决定的联系。记者奉社命视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亲历陕甘宁三省，曾与各有关方面作细挚之研究，深觉西北局势之重大机微与紧迫，非中央当局与全国人士加以真实之觉察与断然之措施，将遗我艰难之国家以不可想象之恶果。”〔25〕

文章明确地报道了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双十二事件之突发，共军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论上反对狂热的群众与青年干部，明白指出，双十二为革命政党所不采取的（军事阴谋），谓此举有酿成长期内战的非常危险，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到青年派强烈之反对。”〔26〕

文章在谈到少壮派军人，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孙铭九枪杀了主和派的王以哲以后写道：“当时局势混乱，势不可已，而坚决主和痛斥少壮派军人，首先以急行军撤退者，仍为共产军。”〔27〕

文章反复宣传了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双十二以来全国人士对于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不外‘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立即抗日’等流行政治宣传，而实际上西北领导的理论不但不同于上述各说，而恰与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动向，为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28〕

“现在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认为中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之对立，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卫国家之生存。同时不必反对法西斯，因实际上中国无法西斯。法西斯之条件，一方面侵略国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压迫国内的工农，中国国内任何势力皆无此第一条件也。”〔29〕

“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起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统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30〕

文章在详细介绍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自江西突围的共产军”几方的强大军事势力之后，对蒋介石如果继续进行“剿共”政策将产生的严重恶果进行了阐述：“我们不要忽视了西北现有的力量和另一方面的情绪，假如政治上不能寻出合理的途径，难得不再出重新割据的局面，因而演成更惨烈缠绵的内战，假如再内战下去，结果必是同归於尽，最低限度是鹬蚌相争”〔31〕

文章发表后，“十五日下午，报纸到了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局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32〕

这一天正是国民党举行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对于西安事变的经过，完全讲了一套假话，根本不提中共和西安事变的关系，更没有提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事。至于蒋介石已口头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几条他才被放出来的事，更不涉及了。“蒋介石看到报纸上与他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于是，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了一顿。”〔33〕

“我这一次是十年来第一次打破了国民党长期新闻封锁的局面，大体上把西安事变的真象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中国介绍出去了。毛主席信上所指的‘你的文章’就是我从延安出来写的这些文章，也是有些人认为我是‘反共老手’的‘根据’。毛主席说：‘深致谢意’，我是不敢当的，我作得太不够了，错误和缺点还很多。有的同志对这些文章进行批判，我认为是很对的。如果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历史现象呢？我自己水平不高，还要很好学习。”〔34〕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长江正在绥远前线，他在事变前两天写的《百灵庙战后行》的通讯中，对由傅作义领导的晋绥军在绥远抗战中承受了重大牺牲之后一举攻克了百灵庙，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迎头痛击的英勇行为激动不已。“许多英勇的战士，在这里作成了对国家神圣的牺牲，他们的热血和头颅，在这里换来了民族的胜利。他们的行径，将永远为后世所讴歌，他们的功业，将被全中国子孙所崇敬。这里的战痕已经快淹没，这里的血迹已经弄模糊，然而他们拚一身以殉国家之精神，将炳耀千古。”〔35〕

他在廿日由归绥转赴平地泉的车上，还回忆着前线将士们的话：“我们的民心与军心，已经确实担保了我们民族战争的胜利。”〔36〕

然而，双十二事件之突发，蒋介石被扣，那时许多在绥远前线的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将领都“颜色激动”〔37〕，“直如冷水浇头”〔38〕，他们是“沮丧悲伤的面孔，坐立不安的神气，沼海汪汪，容颜惨淡。”〔39〕当然也就无心于继续抗日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刚刚遭到一些挫折，但由于事变发生，却立刻又变得猖狂起来：“某方（编者按：指日军）以为陕变既起，绥局有机可乘，十六、十七两日，召集匪伪各部领袖在代德（嘉卜寺）开会，拟于十八日开始总攻。敌机此时全线大肆活动，散发两种小型传单：一类是恐吓性质，如谓：“你们良民百姓赶紧投降。”“我军有精良武器”等。一类是煽惑性质，如谓：“你们蒋介石已遭暗杀！”“你们已经没人领导！”“你们国内已经大乱”〔40〕等。

此时，长江对西安事变还很不理解，他为祖国的前途担忧，他感到十分困惑和痛苦。在其1937年1月17日写的《沉静了的绥远》一文中，真实地表露了他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此时远戍在百灵庙、大庙和绥东前线的守土将士，他们对新年作何感想？战后的创伤，战场的空寂，在怒吼的朔风中，展望无边白雪覆盖的蒙古草原，现状是相当的辛酸，前途尚有不可捉摸的期待。新年是到了，他们对新年是如何排遣，我很为他们系念。我自己在除夕那一天，是提出朋友的手枪在院中朝天放射，希望在枪声中打破寂寞与凄凉！”〔41〕其忧国忧民的深情已跃然纸上。

由于环境的局限，长江当时对事变的真正原因，以及其后将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时尚未弄清，他只觉到：“西安事变，把绥东前线的一点热气，消散了八分。本来要再度进取的军

事企图，因陕变而无从作起。”〔42〕

因而，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中，对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未能作出说明，或者，客观上也不允许他作出说明。由于思想及时代的局限，文章在谈到对张、杨采取的“手段”时，却有不恰当的评述：“双十二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所采取的“手段”，一方面破坏国家纲纪，军队的纪律，而尤以用政变的方法，袭劫统帅，除法律与道德上造成重大责任外，万一对蒋委员长之安全稍有不慎，很有酿成大规模内战之可能。当事者对于此点，至今亦深致其恐惧之回忆。”〔43〕我看这只说对了一半，这里有它的片面性。

可是，在他赓即发表的《陕北之行》中，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原因，及张、杨在事变中的作用，即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中共政治局得到周恩来之报告，引起极大之论辩。结果，参考张学良所提之新材料，与将国内外大势重加研究的结果，认为有转而‘联蒋’之必要。”“这样转变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族路线，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御侮。”〔44〕

“基于此种立场，共产党乃力谋对国民党之政治妥协，化除彼此间绝对的政治和军事的对立，张学良与周恩来正式接洽之后，共产党意中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终于爆发了出人意外的‘双十二’事变。”〔45〕

从今天的党史资料查证，这样的报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对张、杨无丝毫贬意，而且表彰了他在国共合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是长江本人认识的升华。这与所谓“反共老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瑕不掩瑜，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亦不能不为长江当年采访之艰辛，观察之敏锐，报道之及时而惊叹不已！

文中确曾写道：“为在某种政治商讨之下，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46〕是否写了“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就证明文章是“反共”的呢？否，文章正是明确而又扼要地阐述了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此时，中共中央的理论，已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发展到“联蒋抗日”的新阶段。在其四项保证中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47〕这与“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有什么原则的区别呢？没有，是完全一致的。

文章还写道：“……连过去的坚强派的反对派算上，对于蒋委员长勤苦谋国的精诚，已有深切了解，”〔48〕似乎又成了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有力证据。“勤苦谋国”四个字是十分空洞的，它可以作各种解释，这也是貌似恭维的话。紧接着长江笔锋一转：“只望蒋先生能以更大的政治胸襟，从政治机构的改革上，促进和平统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49〕这就是说，蒋介石必须放弃“剿共”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非此别无他路。

十七岁的长江，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流落汕头，以讨饭过活，重病几死，因有人施药，后又得救。”〔50〕此时他“思想十分茫然，不辨方向。〔51〕”他怀着一颗读书救国的炽烈的心展转去到南京，谁知却“误入歧途，”考入了国民党在南京的中央党务学校。校长就是蒋介石！学校以培养国民党高级党务人员为目的。如今，长江非但不能为校长

"尽忠"，反而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公开揭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老底，逼着他要采纳虽五次围剿也未能消灭的共产党所提出的政策方针，能不使他怒火中烧？！于是立即下令对长江进行监视，对他的私人信件进行严格的检查。

长江在重庆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入党后，蒋介石更是暴跳如雷，一九四一年春，手签了逮捕范长江、邹韬奋的命令。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传达了恩来同志从重庆发来的紧急指示，要他立即去香港，与廖承志同志单线联系，并主持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的工作。长江在《华商报》上连载了一篇长达十余万字的《祖国十年》，对当时情况，有如下记述："三中全会过后，我在南京首都招待所会到胡宗南先生，向他略发牢骚，对于我这样公忠坦直的新闻报导，竟遭此不公道的'关顾'深致不平。他说："你既然敢于讲这些大问题，自然不必怕旁人对你特别注意了！"〔52〕

但是，闸门已经被冲开，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的堤已经无能为力，长江乃废寝忘食又赶写通讯，报导了他从百灵庙前线为采访西安事变沿途惊险的经历，以及他"生平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向他"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以及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主张"〔53〕的实况。紧接着从二月十六日起，连续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冒险飞兰州》、《兰州二日》、《到西安去》、《闯入六盘山》、《二、二事变》等八篇约三万字的通讯。毛主席信中所说，我们都看到了，这"都"字，必然是指上述文章。这三万字通讯最后一篇注明是1937年2月22日写毕于上海，也就是说，他是在七天中赶写出来并立即在上海《大公报》公开发表了的通讯象一颗又一颗的重型炸弹，炸开了国民党十年来严密封锁的新闻大堤，全国人民从长江的有如巨浪滚滚，气势磅礴的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让全国上下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迫使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基本上得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使焦头烂额的中国，在极短时期中，突然发出万丈光芒。"〔54〕

《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等文章与其两月后写的《陕北之行》是姊妹篇，而《陕北之行》是更为直接地报导了当时延安苏区的见闻，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不朽的名篇。但从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这个意义上来讲，《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更有其特殊的供献。

1985.4.9.夜于四川内江市

注：本文使用了以下资料：

一、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23〕〔24〕〔25〕〔26〕〔27〕〔28〕〔29〕〔30〕〔31〕〔43〕〔46〕〔47〕〔48〕〔49〕

二、《毛泽东书信选集》〔1〕

三、长江的一篇大字报：《关于"反共老手"问题——答若干同志问》〔2〕〔3〕〔13〕〔16〕〔18〕〔21〕〔33〕〔34〕〔53〕

四、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4〕〔5〕〔7〕

五、张季鸾：《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6〕

六、长江：《西北近影》〔8〕

七、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9〕

抗战时期内江文艺活动述略

梅　英

内江地当成渝交通的要冲，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成渝两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影响到内江。首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文化教育界，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热潮，随即各界青年都曾采取不同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内江的抗日思想，早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就深深地播下种子。“九·一八”东北沦陷后，当时学校有关课程的教学，如史地、语文、图画、音乐等课，老师们都很自然地与抗日的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学校经常利用集会讲东北被日寇占领后同胞遭受的苦难，义勇军英勇抗日事迹等。学校还经常请过往名流讲演，如黄炎培曾到沱江中学讲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抗战前和抗战初期范长江也曾几次被邀请在沱江中学作过讲演。所以，抗战前，内江抗日救亡的思想，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有较好的基础。

抗战开始不久，《内江日报》副刊《血光》创刊。这是一个专门的抗战文艺副刊，这个副刊由我负责编辑。当时社长是苏敬五（鸿宽）是一个退职多年的川军团长，总编辑为苏东风，1938年到1939年闻化鱼曾任编辑，记者袁去非（泸州人），这时报社有进步空气。《血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成长的。《血光》写稿的人有杨叔（刘石夷）、李石锋、高兰（著名朗诵诗人郭德皓）、李冰炉、周白帆、林涤非（梦幻）、廖柳涛（友陶）、闻化鱼、吴天嘏、何亮，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为余洪如、寒侠（万庆余）、王庄、温余波、阳光（当时的名字记不清）舒杰（何华国）等，也转载过一些有名的文章，为丁玲《七月的延安》周扬在《文艺战线》和茅盾在《文艺阵地》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名人的新诗、杂文和长江的战地通讯等。编者和作者都是纯义务的没有编辑费也没稿酬，但来稿却很拥跃，大家都以极大的热情来耕耘这块园地。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逆流中，才被迫停刊了。记得《血光》最初在报上出现时，国民党县党部有人来问：“为什么叫《血光》？”闻化鱼听说，他说，“再来问，就说抗日战士在前线杀敌，为国捐躯，不是流的血，难道是流的尿吗？”可见《血光》一开始就被国民党注意，到反共高潮中被扼杀就是必然的事了。《血光》还设过短

八、《长江自述》〔10〕〔11〕〔14〕〔15〕〔17〕〔19〕〔20〕〔22〕32〕

九、徐铸成：《国闻通讯社》和旧《大公报》〔12〕

十、长江：《祖国十年》〔52〕〔54〕

十一、长江：《陕变后之蜕远》〔37〕〔38〕〔39〕〔40〕

十二、长江：《百灵庙战后行》〔35〕〔36〕

十三、长江：《沉静的蜕远》〔41〕〔42〕

十四、长江：《陕北之行》〔7〕〔44〕〔45〕

十五、长江：《我的青年时代》〔50〕〔51〕

期的《文艺信箱》，对青年进行文艺创作和阅读的指导，但为期不久，因力量不够，曾商量由学校的一些教师负责，也未实现，便停了。《血光》为周双刊，每周两期中必有一期在星期日，星期日有更多的读者，也是争取得来的。此刊自1937年下年创刊，到1941年3月停刊，共办三百余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血光》还选了一些文章（本刊和《华西日报》）、《大公报》刊印为集子，名为《血光集》。《血光集》一共出了四集，由成渝井内各书店代售。

与《血光》互相配合进行抗日宣传的还有一个不定期的文化综合刊物——《文化动员》。此刊与川中办得有声有色的抗战文艺月刊《流火》为姊妹刊。此刊作者如郭德皓、王杞余、秦光银、闻化鱼、林涤非、吴天嘏、砀叔、李石锋、李冰泸、周白帆、梅英等，阵容亦颇整齐。《文化动员》曾刊载老舍在沱中女生部公开讲演，题为《抗战文艺的新动向》。他指出文艺投入战斗行列的伟大作用，例举了全国不愿作奴隶的文人在前线和后方的工作方式和一些作品，如丁玲的《七月的延安》，赵树理的短篇小说，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全国抗敌文协会员，分赴各战场的宣传写作等。老舍还介绍自己正从事通俗文艺的创作，在重庆与老向合办了一个《抗战到底》的文字通俗，形式多样的刊物，很受读者欢迎。他又谈到准备要写剧本。他认为剧本比小说更接近广大群众，影响更大。老舍的这篇讲演，是我和砀叔作的记录，刊载时，就是用的这记录稿整理的，所以印象较深。

《文化动员》还编一套丛书，名《文化动员丛书》，已出版的有梅英的抗战长诗集《天明了》、《北国招魂曲》，李冰炉与周白帆合作的剧本《运输舰》。计划编辑出版的不下十种，如林涤非的诗集《铁的行列》，砀叔的《诗歌选集》，都已在《文化动员》上预告，后因《文化动员》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中被它的中宣部勒令停刊，丛书也没能继续出版。《文化动员》只发行了三期，但影响还是不小的。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逆潮扑来，内江的进步文化人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撤职，有的被迫出走，《内江日报》也被国民党接收。曾经一度与抗日救亡运动一起兴盛起来的内江抗战文艺运动，在国民党消积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下，与整个抗日救亡运动一起，被暂时压了下去。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沱江中学部分学生在教师廖友陶的指导下，组织了一个文艺小组，借《内江日报》出刊了半月刊《沱风》进行抗日宣传。

抗战初期，内江的抗日救亡组织，为“兴华救亡歌咏话剧、”“三一三剧社”等曾以各种文艺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话剧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曾演出过《三江好》、《菱姑》、《血债》、《如此人家》、《芦沟桥事变》、《八百壮士》、《保卫大武汉》等剧目，可以说是内江真正有话剧演出之始。但这些活动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便被扼杀了。

皖南事变，激起了国统区爱国者的无比愤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文艺界向国民党进行反击，而其中影响最为广远，对国民党刺痛最深的，莫如一九四二年郭沫若编的《屈原》一剧的演出。《屈原》被禁演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也遭到迫害，出现了名剧人的“第二次流亡”（此外地名剧人到重庆为第一次流亡）。于是相继有“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剧专剧队”先后到内江演出，一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进步名剧人来内演出的话剧热潮（编者按：关于抗战时期内江话剧演出，另有专文介绍，本文从略）。

抗战初期，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下，以银行界为主要成员的“内江京剧社”，也

回忆1944年中艺、剧专、中术三剧团在内江的演出活动

肖晴天(稚苓)

八年抗战，国土日蹙，国民党政府局守西南一隅。随着政府西迁，无论资金、工商企业及人才都大量涌入四川。内江地当成渝中心，1944年内具有全国最高水平的中华剧艺社，国立艺专剧团及中国艺术剧社相继来内江演出，使观众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可称为内江戏剧演出史上空前的盛事。

1944年一月中旬名演员项堃，代表中华剧艺社来内江与有关方面签订演出合同。项本人1937年至1939年曾参加陈嘉庚先生主持的华侨演剧队、到过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宣传抗日救国，国民党御用剧团利用高薪厚禄收买他，项不屑一顾，回国甘愿到中华剧艺社既任演员又跑外勤。不久中艺全班人马即到内江，下榻社会服务处和中国旅行社，计有名导演应云卫、史东山、陈鲤然、沈浮、贺孟斧，剧作家宋之的、陈白尘、吴祖光。演员有路明、张逸生、金淑芝、张瑛、李伟、徐琴芳、丁然、吕恩、刘郁民、赵蕴如、钱千里、吴茵、赵慧深、白杨、顾而已等四十余人。经过短时休整，元月下旬在当地《内江日报》上刊出预告演出日期，随即在天星大戏院（惠民宫）首次上演郭沫若所编的《孔雀胆》四幕五场古装历史悲剧。由路明饰阿盖，李伟饰段功。当梁王听信谗言，意图假手女儿用孔雀胆毒害女婿时，阿盖处在父与夫的矛盾间，痛苦已极，后知道段功被暗害，终于自杀了。这出剧情节大起大落，处处扣人心弦，演员表演细腻，感情逼真，催人泪下，使观众受到不同程度的薰陶感染，普遍获得好评。

中华剧艺社社长应云卫，系三十年代左联成员，他是电影和戏剧界的老导演，抗战后在上海联合影剧组成影人剧团，从前线到后方演出进步戏剧，《长夜行》、《离离草》、《上

为抗战将士募集寒衣作过义演。西北京剧科班“复声剧社”来内演出爱国名剧《陆文龙》，获得很高的声誉。

抗战中期（1943—1944年）在内江举行美术展览的名人除邑人张善子的《正气歌》和国外曾展出的狮虎遗作外（善子先生逝世于1940年10月）、张大千、徐悲鸿（《田横五百士》）、丰子恺等都曾在内江举办过画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胡藻浜的殉国画展。胡先生由于拒绝与日寇作画被杀害，由其遗孀携画件到后方各地展出，以华南虎为主要题材，在内江以收门票为主，《内江日报》曾为写专文介绍。侨居内江的金石篆刻家王王孙也在抗日时期展出过《正气歌》拓片。这些展品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使内江人民得饱眼福，更可贵的是大都极富爱国主义精神，使内江人民受到深刻的教育。

海屋檐下》、《屈原》、《天国春秋》、《胜利号》、《大地回春》、《棠棣之花》等，为国家生存，人民疾苦大声疾呼，可算戏剧界进步的战士。这次出外巡回演出，是为了扩大宣传影响的创举。

接着上演阳翰笙编的《天国春秋》古装历史悲剧，仍由应云卫导演，项堃饰演东王杨秀清，吕恩饰演洪宣娇，金淑芝饰演傅善祥，张逸生饰演韦昌辉。这出剧无论从舞台布景，人物性格及演出效果看，都极成功，连演五场，座无虚席。

第三个演出剧目，为陈白尘、吴祖光、杨村彬等集体创作《胜利号》、四幕时装喜剧，由应云卫导演，路明、金淑芝、吕恩、刘郁民等人演出，观众亦很踊跃。

中艺这次来内公演，虽只有三个剧目共演十四场，大大提高了内江观众的话剧欣赏水平，使大家知道，任何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是须要多少人精心浇灌，为之呕心沥血，多么来之不易，人们应该重视它，珍惜它。

二月十日中艺全部人员到自贡，十一日起在自贡胜利剧院连续上《孔雀胆》等三个剧目。恰正这时，国立剧专剧团由杨村彬团长率领来到内江，主要演员有冀淑平、许庆芝、郭兰田等三十余人，项堃亦应邀参加演出。第一个剧目为顾一樵编的《岳飞》（又名《精忠报国》），四幕十二景古装历史悲剧，杨村彬导演，服饰均经专家考订设计，演员阵容整齐，布景富丽堂皇，观后令人悲愤。十二金牌，千古遗恨；光昭日月，气壮山河。来内一共演出五场，场场客满。

第二个剧目，名作家巴金的《家》，由曹禺改编为四幕八场，家庭伦理悲剧。反映五四运动新旧矛盾，富有四川特色。导演郭兰田纯熟仔细，演员个个认真卖力，完美的灯光布景都是当时最佳设备。演员中饰演瑞珏的许庆芝，饰演觉新的项堃，给人印象最深，最为人们称颂，整个剧情结构紧张，构思新颖，不愧为五四运动后的一部名著。

第三个剧目，沈浮编的《重庆廿四小时》三幕现代讽刺剧，描写抗战中人民流离的苦难生活，有辛辣的讽刺幽默，极富现实意义，赢得广大观众的好评。

第四个剧目，杨村彬自编自导的《光绪亲政记》（又名《清宫外史》）五幕古装历史剧，项堃饰演光绪帝，赵蕴如饰演慈禧太后，不温不火，栩栩如生，至今内江观众对该剧仍赞赏不已。

国立剧专剧团在内江演出十六场后，于四月廿日专车赴自贡演出。重庆的中国艺术剧社导演司徒慧敏于五月二日来内江，与内江有关方面签订了演出合同。五月二十七日，中国艺术剧社全班人马到达内江，主要演员有张瑞芳、金山、蒋天流、蓝马、白颂天、谢怡冰、王萍、郁风、黄宛苏等四十余人。在全记戏院先后上演《戏剧春秋》、《草木皆兵》、《处女的心》、《天上人间》、《杏花春雨江南》、《牛郎织女》等六个名剧。

《天上人间》是抗战初期负盛名的剧本，作者夏衍，导演为司徒慧敏，通过剧情将抗战的新生力量呈现观众面前，十五岁的阿潮能接受真理，明辨是非。小姑娘喻志华能跟随时代，走向进步的道路，给人民增强了抗敌的信心。主要演员有金山、王萍、蓝马、黄宛苏、白颂天、宋宛琼、曾昌、罗坚、殷野等。

《草木皆兵》是夏衍、宋之的、于伶的集体创作，史东山导演，剧情为弧线式的进行，每当事件纠葛进入高潮时，马上被另一件事接替了下去，仿佛象波浪的起伏，奔腾不息，引人入胜，有的人叫它做连环套剧。该剧揭露敌伪组织的末路，讽刺辛辣，刻画入微，在重庆

四十余年忆“兴华”

胡大生（露华）遗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祖国大地，战火纷飞，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在社会各阶层人民心中广泛升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华民族！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起来，抗争！一片抗敌救国的怒吼声浪，震撼了全国。“内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就在这年（1937年）（应是1938年——编者）我与梅志尧一起参加了“兴华”。“兴华”的社址座落在上南街何氏宗祠巷内，在约二十平方米的三间小屋子里，大家就挤在这屋里工作，可从未问过“兴华”是何时成立的。我想，芦沟桥事变的炮声，应是她催生的礼炮吧（他误记为1937年参加，故有此说——编者）。

由于人员的增加，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兴华”进行了一次改组，也是我知道的最后一

曾连演三十余场，均告满座，颇具号召力。这次来内江上演，由林朴晔任舞台监督，主要演员有张瑞芳、王萍、宋宛、黄宛苏、陈潞、季虹、白颂天、蓝马、黄宗江、叶良柯、乔婉、曾昌、胡中里、殷野、岳健中、何一健、田根等十七人，由金山、赵志游担任演出者。

剧中人物张瑞芳饰演交际花得心应手，蓝马饰演冲天炮老成机警，王萍饰演钱英娇泼辣娇痴，人物性格个个刻画得淋漓饱满，协作谨严，发挥了最佳水平，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检旧报，《草木皆兵》的导演史东山当年曾对记者说：“话剧是难适合观众的视度的，不过在有声电影尚未普遍完成立体与有香有色的理想时，话剧也自有其独立的生命，与永恒的价值。”顺录于此。

中国艺术剧社在内江演出完毕，适逢中华剧艺社第二次到自贡，七月九日在胜利剧院上演陈白尘编著的《大地回春》，五幕六场现代剧，因此中国艺术剧社便前往乐山演出，没有到自贡。

中华剧艺社于自贡演出十五场后八月初原班人马又重返内江，节目变动了，先演《大地回春》后，继演《金玉满堂》，沈浮编剧，刘郁民导演，四幕戏剧，最后上演郭沫若编的《棠棣之花》，五幕六场古装历史剧，激昂慷慨，振奋人心，三个剧共演十五场，再一次受到内江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四四年这一年内，内江在演出话剧方面的收获是不平常的，具有全国最高水平的三个剧社，相继来内江演出，使观众耳目一新，大饱眼福，成了空前的盛事，值得记下以为纪念。

一九八五年七月于甜城

次改组。改组的结果，王竹村当选为社长，谢碧芳当选为歌咏组长，雷再熙当选为话剧组长，张图远当选为总务组长，我当选为社会教育组（简称社教组）长。梅志尧同志，他能力较强，什么都干，确实是社里的骨干之一，当时他负责什么工作和名义（副社长？）至今真记不起了。

“兴华”内部各组，只有负责人，组员则是全体社员，各组之间也并无严格的分工，何组需要开展工作，都交社务会议议决，指派人员参加，乃至全体合作，共同完成。每天晚上对明天要做的工作都开会研究，统一规划，分头进行，全力以赴。

“兴华”自改组后，人员充实，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同时我们又适当地开展了“自我检讨与群众帮助的生活会”、“学习会”，大家胸襟顿时开朗，耳目一新，情绪高涨，干劲倍增。社务工作，真是生气勃勃。

首先我们确定了我们的重点宣传对象——农民和主要的宣传阵地——农村，因此我们就按照各乡镇逢场的日期前往开展工作。近郊如棒木镇、白马庙，远乡为观音滩、一洞滩，凡内江所属乡镇都是我们宣传阵地，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都是我们宣传对象。我们还一度到富顺县属的三多寨开展工作。

“兴华”下乡宣传，都是徒步旅行，自己扛着道具行李，走乡串村。我们下乡，当天能回返的，都争取回城，当天不能回返的，就借宿在当地学校，或乡镇公所安排的其他地方。学校老师和许多乡镇公所人员对我们的宣传工作都给予热情支持，为我们张罗食宿，解决工作上的困难。下乡宣传，可以想象得到，确实是很辛苦的：大家跋涉了数十里，又抓紧在散场前时机，急忙演出节目，有时晚上还演出。但大家劳累了一整天大夜之后，躺在学校宽敞的教室里，回味当天群众与我们敌忾同仇的情景，或与同志们倾谈当日工作得失时，或争论时，真有说不出的振奋和高兴。

我们真也是受群众欢迎的。记得我们去三多寨的演出，因有梅志尧的一个李姓同学关系，为我们妥善解决了食宿问题并协助开展工作。结束后邀请主人座谈，他盛赞我们演出成功。离开三多寨时，群众自动聚集一起，列队送别，依依不舍。不愿作亡国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那沉寂的三多寨上空，激荡起了抗敌救亡的热潮。

“兴华”成员，有小学教师、机关小职员、社会失业青年、中小学生及家庭妇女，除学生外，大都在二十岁左右。他们不求名，不图利，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拯救祖国危亡，大家集合在一起，掏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挤出最低的生活费用，献出一切工作需要的物资（乃至从朋友当中借、“拼”、要），凡是可以借助的力量，都一齐调动起来。

我们以歌咏和话剧（也有街头剧）两种主要形式进行宣传。歌咏和话剧都是选的当时流行的救亡歌曲、短剧。歌曲有《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枪口向外》等。歌咏谢碧芳负责她的声乐很好；曹克成（又名亚琪）能演奏小提琴又能作曲。话剧、街头剧有《放下你的鞭子》、《抗争》等，节目大都短小精干，极富战斗性。

我到“兴华”之前，从未上过舞台，更不要说演剧了。也是出于至诚的爱国之心，跟随大伙宣传抗日救国，却自觉自愿去承担我在通常情况下万难接受的任务——登台表演。一次准备排演一出独幕剧时，剧中人物有日军官、汉奸、老农和他的女儿等，剧务组长雷再熙提出自己担任扮演日军官，其他的人物也都一一派定，只有那流氓加汉奸一角，无人愿意扮演。这时雷再熙却在搜寻这个角色，当他把目光久久停留在我身上时，我也在思想上引起了斗

争。我想，敌占区凶残的日冠与卖国求荣的汉奸，是我民族的大敌，如果不在舞台上出现加以鞭笞，怎么能是生活？怎么能唤起民众共同抗敌救亡呢？因此，我说："好吧，让我试试。"

经同志们的建议与剧务组的帮助后，我又翻了一些抗敌的图画、报刊，力求在外型上塑造这一典型人物的同时，又着重从汉奸的内心世界活动去挖掘，让灵感全部进入角色。因此效果还不坏。记得参加圣水寺当时驻军主办的几个宣传单位的会演，在剧情发展到斗争高峰时，台下一片叫喊声："打死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怒吼声潮，淹没了整个会场；甚至有几个观众，激动得跳上了舞台，要帮助那"村姑"惩处汉奸的当儿，大幕急落，才"解了危"。从那以后，排演剧目，剧务负责人，总是安排我扮演正面人少，反面人物多，主角时少，配角时多。

壁报是我负责的社教组的工作之一。我大都从《大公报》、《新民报》摘选材料，和在社员中征稿编辑出版，由我和海志尧缮写张贴。有一次我路过原东坝街民众教育馆门前时，见到那里摆设了一块大黑板，上面的粉笔字迹，日久模糊，不可辨认。我看那地方适中，人多热闹，是可利用宣传的好地方。于是我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去与馆长肖耀德先生商洽这里板报由"兴华"来办，改为壁报，报名改为"民众壁报"，肖馆长慨然同意。可是当壁报刊出第三期以后，黑板突然收起，被委婉谢绝了。事后检查，除了在第三期壁报中缝上写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的口号外，其它并无任何可议之处。这口号是我与碧芳商定的。

前面说了，"兴华"的经费开支是较困难的，但"兴华"从未接受过任何方面的补贴。至于有的说，"兴华"与其他剧社联合演出募捐，以加票的一部份归属"兴华"的事，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还搜索不出这样的事来。联合演出募捐，支援前方，势所难免，但事后多由社长，总务同志与有关团体人员处理妥当，而"兴华"从未单独举办过募捐演出活动。

有的说，"兴华"参与了冯玉祥将军与其夫人来内举办献金活动，实无其事。冯将军来内举办献金是1940年以后的事，而"兴华"被迫解散，却在1940年以前。

自从我们办壁报被民众教育馆谢绝以后，我们开展工作，就越来越感到困难，一天突然接到县政府的指令，要"兴华"与"三·一三"等剧团合并，改组，并传闻将派人主持领导。"兴华"同人经研究，一致认为：我们的组织是民主的，我们的宣传对象是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我们的工作阵地是广大的农村、乡镇，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同他们很难取得一致，决不能委曲求全，因此决定采取拖延对策，虽又经社长王竹村一再与有关当局解释说明，但仍未取得谅解。最后，国民党县府三令五申，勒令限期解散。

在此，特别必须一提的是："兴华"在解散前一月左右，一天夜晚，突然发生"被盗"事件。

"兴华"同人大都是利用公私事之余时间，来社参加活动。社里长期是社长王竹村住守，，但竹村有时也因公因私不在社里住宿。一天晚上，竹村不在社里住宿，第二天同志们去一看，只见满地书刊、服装、道具、工作日记抄得乱七八糟，经大家清理检点，发现并不没被盗走什么东西。当时还有同志风趣的说：可怜梁上君子白用了一夜精力，却两手空空，大失所望啊。这真是一桩"奇怪的盗案"。

其实，也不奇怪。经大家分析，认为这和国民党县府三令五申强迫合并改组与我们开展

抗战初期内江商界的一个抗日救亡组织“三·一三”剧社

丙丁整理

1938年初，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时间，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那时沱江中学附属小学主任吴天嘏（又名吴纯）任蜀风绸布号的秘书，与绸布业的人有交往，常鼓吹抗日救亡的事。小西街东来百货号经理李雨锋的弟弟李冰炉和他的朋友周白帆，常在报刊写一些抗战作品。经他们鼓动，逐渐在小西街青年商人中酝酿组织起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社。因成立之日正是当年3月13日，所以就把这个剧社命名为“三·一三救亡歌剧社”。

这个组织的成员除吴天嘏、李冰炉、周白帆外，还有东来百货店的李雨锋，蜀风绸布号的肖叔明、肖叔良弟兄，源生昌印刷社的苏泽高，铨源老号的钟竹溪，荣集祥绸布号的张大

工作日益困难的种种迹象联系起来看，这不是非常明白了吗？这倒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以后大家一再研究，从长远计，只好选择解散的道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一个细雨如丝的早晨，也是“限期解散”最后那天的早晨，社长王竹村同志饱含着满眶热泪，将“内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的挂牌，从何氏宗祠巷口取下来，捧回社里，社里的同志们，人人义愤填膺，不发一言，久久沉浸在一种坚定而崇高的信念之中——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没有解散！不当亡国奴的人们，都会团结在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继续前进，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兴华”解散后，所有大幕、内幕、道具等物，均赠送给上南街女子师范学校（应为内江县立乡村师范学校——编者），由该校校长（女）亲自接收。

王竹村同志处理了“兴华”解散的善后事务后，带着病躯回到一泗滩家里，不久就传闻他不幸逝世。

1983年3月26日回忆于山城

胡大生（露华）同志是“兴华”的重要成员之一，有的资料说他是副社长（他的这篇资料未如是说）。他的这份资料补充了许多以前有关资料的细节和填补了一些空白。这对于进一步了解“兴华”的情况颇有帮助。胡大生同志已于前年逝世，因此这份遗稿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此稿也有一些与其他资料说法相矛盾之处，我们编此稿时，只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保存了他的原意。原稿存大生胞兄胡锡珍同志处。这里，对胡锡珍同志为我们提供这份资料表示感谢！

——编者